清史纂修

《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

牛润珍 张慧

《一统志》纂修肇始于元，明、清两代沿承。清代三次编纂《一统志》，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前后150多年，撰成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三部巨著。三部《大清一统志》之编纂是清朝重大文化工程，工程之背景、启动、组织、实施与管理、告竣也多有周折，其得失经验于《清史》纂修甚有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将就《大清一统志》纂修缘起，三次编纂所历艰曲、主要难题及如何解决、纂修教示等问题逐一考证、探讨，以期有裨益于《清史》编纂与研究。

一、《大清一统志》纂修缘起

《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因缘于清代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变迁。康熙八年（1669）五月，康熙除掉了鳌拜，开始亲政。这时的清朝，经过20多年的开疆拓土和艰难治理，巩固了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康熙亲政后，一方面清理鳌拜的势力和影响；一方面更新朝政，修文图治，整齐人心风俗，启动史志编纂，“命修《一统志》。”①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尽管定鼎北京已20多年，仍不被众多汉族士人所认同，收拾人心尤其是士人之心，树立清朝的正统地位，愈益成为清朝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者，随着清朝版图的扩大，熟悉国情，了解、掌握各省地情，又是清廷励精图治所必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编修《一统志》便成了朝廷的一项要务。

最早提出纂修《大清一统志》的是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时间在康熙十一年七月一日。其疏文称：

> 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围、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也。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

康熙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御旨：依议。关于卫周祚上疏、礼部议处及皇帝御批等，康熙《镇江府志·宪牌》有较为完整的记载。从有关记载看，《大清一统志》的编纂是由进呈书籍与撰修各省通志引起的，由府州县志汇辑为直省通志，再由各直省通志汇为《一统志》，自下而上，逐级成书。府州县志由各级地方长官负责，直省通志由督抚主持，礼部负责督促，收掌保管，待齐集后，一并移送翰林院，

[收稿日期] 2007-9-15
[作者简介] 牛润珍（1954—），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张慧（1982—），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北京100872

由翰林院编辑成《一统志》，然后进呈皇帝御览。这样，《一统志》纂修的关键是各省通志，通志是《一统志》的基础与前提，所以，清廷将工作重点放在通志的编纂上，通志编修以河南、陕西二省为蓝本。《一统志》与《通志》纂修工程的启动可谓雷厉风行。康熙十一年七月一日卫周祚上疏，六日皇帝作出谕旨，十一日行文到礼部，二十四日由礼部拟议，再次奏上，二十七日皇帝再次御批，发回礼部。礼部抄录，驿传各省督抚。闰七月十五日已达两江督抚，并牌照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二十四日各承宣布政使司又发牌至所属府州县衙，编撰地方志书。从卫氏上疏到论议、决策与实施，前后不到两个月，其办事效率如此之高，也见康熙对编修《一统志》十分重视，同时也说明朝廷官署政令畅通。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三藩之乱”爆发，牵动朝廷上下，平叛成为当务之急，各省通志和《一统志》纂修受到影响。历时八年的平叛结束后，《大清一统志》编纂事宜又被提起。据《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四月条：

> 十二日甲申。辰时，上御乾清门……大学士明珠等奏曰：“至于各省纂修通志送部，前奉圣谕极当。《一统志》关系典制，自应催令速修。从前用兵之际，各省所修通志稍觉迟延。今兵事既息，俟各省修完送到之日，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上曰：“是。……各省所修通志作何察催？及应修《一统志》事宜，着礼部确议具奏。”

至于礼部如何确议具奏，未见有史料详载。但从康熙《江南通志》书前所载于成龙、余国柱《序》，可推知其大概。于成龙《序》撰于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云：“我皇上御极二十有二年，癸亥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限三月成书……先取各省之志，以成一统之志。正欲于众中求其详，于繁中举其要，夫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成乃上之于府，府荟集之为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抚，督抚荟集之为通志。通志归之礼部，然后辑为《一统志》。”康熙《江南通志》正是奉礼部之檄，于三月限内完成。成书之速，当是利用了康熙十一年的未成稿。从于成龙、余国柱《序》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二十二年重新启动通志编修，当在这年的夏天，仍由礼部发布檄文，其作法与康熙十一年并无二致，可以说是仍然沿袭了已有的修志程序。《大清一统志》纂修序幕由此揭开，以后随着清朝疆域的开拓，版图不断扩大，行政区划的调整与设置，省府州县分合置废，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官制变化，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踵继康熙，相继纂修《大清一统志》。

二、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编纂

康熙十一、二十二年，诏修各省通志，为编纂《一统志》作前期准备。至二十四年，已有十余省通志成书，如《山西通志》、《畿辅通志》、《盛京通志》、《江南通志》、《浙江通志》、《江西通志》、《福建通志》、《湖广通志》、《湖南通志》、《广西通志》等，纂修《一统志》的资料大部分具备。是年底，礼部提出《一统志》编纂方案。据《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条：

> 礼部纂修《一统志》，请给桌饭银两。其纂修处，应交与内阁。上曰：“纂修《明史》，俱撰文字，故多费时日。若修《实录》、《会典》以及此书，不过誊录，并非撰文，岂宜迟缓？凡纂修各馆，俱宜定限，尔等议奏。”

礼部的纂修方案拟仿《明史》馆例，康熙认为《一统志》不过是编辑资料，临时突击一下即可，不必像修《明史》那样，旷日持久，因此提出限期完成的指示。君臣关于组织编纂《一统志》方案的讨论，可谓是《大清一统志》编修工作的开始。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第508页）曰：“康熙二十四年，敕修《大清一统志》。”

康熙二十五年，设立《一统志》馆。江南道御史严鲁榘奏请将台湾、金门等处增人通志，汇集于《一统志》。《清实录·圣祖实录》卷124康熙二十五年正月甲申：

> 江南道御史严鲁榘疏言：“近礼部奉命开馆纂修《一统志》书，适台湾、金门、厦门等处已属内地，设立郡县文武官

员。请敕礼部，增入通志之内。又广东添设花山县治，通志所未载，亦请照例增修。”

《一统志》馆成立之初，第一件事就是选调总裁官、副总裁官、纂修官等。由内阁、翰林院等部门办理，最后由皇帝裁定。《康熙起居注》对《一统志》馆副总裁官的选定，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康熙二十五年四月：

十三日丁酉。辰时，上御瀛台勤政殿……明珠等又奏曰："纂修《一统志》副总裁，臣等公同推举原任左都御史徐元文，学士徐乾学、韩菼、张英，詹事郭棻，侍读学士高士奇，庶子曹禾，祭酒翁叔元，共八员。"上曰："韩菼、翁叔元不必举派，余俱着充副总裁。"明珠等又奏曰："此内专委何人?"上曰："着陈廷敬、徐乾学专理。"

因为副总裁具体负责编纂事务，所以清廷对其人选甚是重视，反复酌量。俟人事班底基本搭建后，康熙对《一统志》编纂提出了明确要求。《圣祖实录》卷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

谕《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等：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有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宏博，体例精详。

综合分析有关史料，可以归纳出这样的认识：纂修《大清一统志》始于康熙二十四年，其实施方案初由礼部提出，并建议将其交由内阁办理。虽然康熙没有明确表态，但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的起居注关于副总裁的拟议，均由内阁会同翰林院作出，说明康熙二十五年内阁已负责《一统志》馆的组建。二十四年以前，檄催各省纂修通志，备辑《一统志》，由礼部负责。自二十五年起，改由内阁操持选人建馆。

康熙初建的《一统志》馆，主要由总裁官、副总裁官、纂修官等人员构成，总裁7人，副总裁6人，纂修20人。实际主持馆务者是一名总裁和一名副总裁。纂修多数为朝官，少数人为民间征士。正、副总裁和纂修均为饱学之士，大部分人参与过《明史》编修，如勒德洪、明珠、王熙、陈廷敬、徐元文、徐乾学、吴任臣、姜宸英、方言、黄虞稷等。

《一统志》馆虽由陈廷敬与徐乾学共同执掌，然陈廷敬同时还担任《明史》总裁官，其主要精力在《明史》编纂，《一统志》的纂修主要由徐乾学掌管。徐乾学首先拟定出《大清一统志凡例》，曰："特敕诸臣，肇修《一统志》，益灼知天下厄塞形势、封域户口、兵民财赋之要，以彰明纲纪，损益利病，奠兹疆寓，亿万斯年，非徒景式廓之图，资考稽之益也。臣等荷蒙简命，忝预编摩……谨自《禹贡》、《职方》及于近世，博采古义，参决群言，标其大凡，以为成书之准。务使识其大而略其细，考其实而阙其疑，取类周详，措辞质古。"据此列出《一统志》类目22：分野、部辖、图经、建置沿革、城池、形势、里至、议论、设官、户口、田赋、风俗、山川、古迹、旧都宫阙、考订、陵墓祠庙、关隘、桥梁、土产、人物、仙释。[2]纂修官依据凡例，分工撰写。姜宸英执笔《江防篇》、《海防篇》等，其《湛园未定稿》卷1收录有《江防总论拟稿（大清一统志)》、《海防总论拟稿（大清一统志)》和《海防篇》附录《日本贡市人寇始末拟稿（大清一统志)》。

康熙二十五年，《一统志》纂修工作铺开，二十六、二十七年整理资料，并着手撰写初稿。二十八年十一月徐乾学遭劾，康熙准其请假省墓。徐氏具疏乞休，曰："《一统志》考究略有端绪"，"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3]。二十六日，谕旨称："《一统志》关系重要，纪载务须详核。宋元《通鉴》原书互相牴牾舛错，议论多偏。卿学博才优，参订考据确实，纂集进览。这所奏俱依议行，该部知道，钦此。"徐乾学再上《备陈修书事宜疏》，曰：

《大清一统志》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贯穿古今，有裨治理，关系匪浅。元代所辑号为精详，今已不传。《明一统志》疏漏舛错，难以胜举。臣向来从事书史，不敢师心自用，必

博访旧闻遗献，冀追愆尤。自兹僻居山野，见闻渐稀，加以精力孰衰，更需一二相助。现在纂修《一统志》、《明史》，支七品俸臣姜宸英、臣黄虞稷学问渊博、文笔雅健，并以寒士蒙恩俾与纂修，在馆十年尚未受职，分辑《一统志》已有成绪，若得随往襄助，一如在馆供职，庶编辑易成。事竣之日仍赴史局，似为两便。其所修《一统志》陆续缴送，俟馆阁诸臣详定，汇呈御览。[④]

从徐乾学所上疏文看，到康熙二十八年，《一统志》编修工作已启动三年多，虽有进展，但效率和速度并不高，所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二：一是“盛京边外所辖地方及奉贡诸郡，凡沿革、风俗、山川、物产无有故牍可稽”；一是“例载本朝人物”，如何采录，纂修官不敢轻为出入。而且，《一统志》与《明史》等纂修工程同时进行，影响了进度。

徐乾学携带图书资料回到原籍后，先后在苏州洞庭东山、嘉善、昆山设局修志，又邀顾祖禹、阎若璩、胡渭、黄仪、刘献廷等参与编撰。据裘琏《横山文集》卷七《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1914 年排印本），赴“五湖之滨，洞庭之山”随徐乾学修《一统志》者有顾士行、黄虞稷、唐叔华、陶元淳、沈佳、吕澄、姜宸英、裘琏、李良年、查慎行、邵长蘅等。直到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徐乾学病死，《大清一统志》并未竣工。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因《三朝国史》、《典训》、《一统志》、《明史》尚未成书，康熙谕召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赴京修书。乾学未闻命而先卒，家人遂将其遗疏及所纂《一统志》稿进呈。康熙诏付有司纂定，由韩菼在徐乾学初稿基础上进行纂修，历时十年，仍未能成书。康熙四十三年，韩菼逝世后，《一统志》纂修工作基本上搁置起来。这样，在康熙年间，《大清一统志》虽未成书，但形成了两个稿本：一为徐本；一为韩本。关于两稿本优劣，雍正时，《一统志》馆臣曾有讨论。杨椿《孟邻堂文钞》卷2《上〈一统志〉馆总裁书》，曰：“承阁下问馆中旧时志稿，徐本太繁，韩本太简，何者为优……椿往在《明史》馆，见徐公所撰《地理志》，建置沿革亦繁。请于总裁朱公（轼）曰：‘《志》为《明史》之志，宜纪明一代之事，宋元前可不必。’朱公深以为然。今《一统志》虽与史志不同，然奉敕为本朝作则。前代事见于古书者，仿《元和郡县图志》，仅书其大概。关于本朝者，内则稽之《实录》、《起居注》、《方略》、《会典》、部院八旗档案，外考之史册及府州县所咨送，下逮名人文集传记，详而不冗，简而不漏为宜……抑椿更有请焉。志之户口，职方氏五男二女；田赋，《禹贡》之‘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也。明天顺间纂修《一统志》，史官聚讼，为名人所讥。今闻有以徐本户口、田赋为多事，韩本删之为是者，是《禹贡》、《职方》不若天顺《一统志》之为当矣。”徐本病繁，不当繁而繁；韩本病简，不当简而简。另外，从姜宸英所拟《江防论》、《海防论》两稿看，也确有细繁之嫌。

雍正三年，清廷“以《一统志》历久未成，特简重臣敦率就功”[⑤]，于内阁重开《一统志》馆，大学士蒋廷锡任总裁，陈德华为副总裁。雍正六年，皇帝为纂修《一统志》，诏谕各省重修《通志》，对于人物采访、撰录、时限、奖惩等，要求公当详明。

这次纂修仍是在馆藏旧稿基础上进行，主要内容是人物撰写，沿袭康熙修志的作法，先《通志》，后《一统志》。然亦有新的变化，即本朝人物一项，先行送馆，编入《一统志》，甚至认为名宦人物的记载比山川风土还要重要。

雍正七年，各地修志甚有声色。田文镜《雍正河南通志总序》曰：“皇上御极之六年冬，特命天下督抚诸臣修直省通志，送上《一统志》馆，谕以登载务期至公，宁慎毋滥，仍许展限至三年之久……文镜承乏河东……先于七年春，檄河南各府州县整辑郡邑志送到……越明年二月，乃始开馆置局，礼聘名彦，焚膏继晷，键户闭关，凡阅期有二月而后成书。书成凡八十卷。”[⑥]顾琮《江南通志序》曰：朝廷督促修志，“诏各省重修通志，录上史馆”[⑦]。因檄江南各府州县修志，在此基础上，再次辑成《江南通志》。朝廷还规定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欲通过制度督促并规范志书修纂。十年，再“特命词臣纂修

《一统志》，分行各省修辑通志以备采择”[8]。

雍正十一年，清廷进一步充实《一统志》馆力量，任命方苞为总裁官，陈德华仍为副总裁。十月初八日，《一统志》馆为征集史料，颁布“行查事项”，曰：

> 内阁《一统志》馆为行查事，照得本馆现编《大清一统志》，克期告竣，校对进呈。但直隶各省府州县户口、田赋、文武职官、公廨仓廒、营卫兵权、盐场、土贡、土司等项，与各书院、古迹、祠庙、寺观中御赐匾额碑记，以及近年增设裁革、修建移改诸多年月，理应务载……并本处城池、学校，境内之山川、古迹、关隘、市镇、驿递、桥梁、河渠……陵墓、寺观等项，尤须一一详载，非行查各省府州县，本馆无凭查考。为此移会贵部（户部），烦照后开条款，作速转行各省，详查造册送馆，以便增辑。此系克期进呈紧要事务，必须文到之日，限三个月内条晰造册报部送馆，勿得迟滞。

移会所开14条款，包括职官员额与衙署、户口田赋、仓廒、营汛卫所、城池、学校、书院、河渠、城堡、堤堰、祠庙、寺观及御题匾额碑记、驿站、盐场、土贡、土司，还有新设府州县及境内山川、古迹、关隘、市镇等。征集资料与纂修《一统志》，都有严格期限，加快了《一统志》成书的速度。

通过纂修《一统志》，使馆臣切身体会到工作的繁难。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曰：

> 仆未受事时，旧志勿论。既立条例后，新纂一郡稿成，随命学子校勘，次山再之，仆三之，始发誊录，及观清本，而罅漏又自见矣。班覆之而更写焉，自视若无遗憾，及各府州志毕萃，而又牙相牴者且百出矣。诸公勿谓此文事之浅者，心与目毕至焉，而后知其曲艰也……是书所难，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迹；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为富，又不能辨其出入离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复讹舛牴牾之病纷然而难理，不知辞尚体要，地志非类书之比也，所尚者简明，而杂冗则愈晦。然简明非可强而能，必识之明，心之专，偏于奥赜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后辞可约焉。其博引而无所折衷，乃无识而畏难，苟且以自便之术耳。故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博引以为富，而无所折衷，犹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约焉，即各致其美，而于体例已不一矣。望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实心集公事，而毋师其成心，仆敢不虚己以听乎！[9]

由于《一统志》纂修难度大，工作繁杂，虽然各省府州县志基本齐备，但仍不能在短时间内告竣。雍正十一年，是纂修《大清一统志》甚有成效的一年，直到十三年，虽未成书，然为以后功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即位之初，即令继续进行《一统志》未完成的工作，至乾隆五年十一月，纂修工程完毕。《高宗实录》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新修《大清一统志》书成，议叙总裁、纂修等官有差。”乾隆为康熙《大清一统志》御制序文，曰：

> 圣祖仁皇帝特命纂辑全书，以昭大一统之盛，卷帙繁重，久而未成。世宗宪皇帝御极之初，重加编纂，阅今十有余载，次第告竣。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有八，统府州县千六百有奇，外藩属国五十有七，朝贡之国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舆所载，方策所纪，宪古证今，眉列掌示，图以胪之，表以识之，书成凡三百五十余卷。

其目次，首为京师，次为直隶、盛京、兴京、江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八省。“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官职、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者也。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各分二十一门，共成三百四十二卷。而外藩及朝贡诸国，别附录焉。”[10]总计凡356卷。乾隆八年十一月刻成，次年由武英殿刊行。经延讲官户部

尚书、《一统志》馆总裁陈德华等进呈，并奉旨开列纂修臣工名单，监理1人，总裁9人，提调6人，纂修113人，收掌15人，謄录28人，监造9人，共181人受到议叙封赏。[11]

康熙《大清一统志》从议修到告成，前后经历三朝共68年。纂修后期，齐召南贡献尤巨，他除辑有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六省志稿外，还撰有《外藩蒙古属国书》。《宝纶堂文钞》卷3载有《外藩蒙古属国书总序》和《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最后，他又协助总裁官对《一统志》稿作了统一的文字勘定。

三、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之纂修

乾隆二十至二十二年，平定准噶尔部，收复天山北路及唐努乌梁海地；二十三至二十五年征服回疆，兼并天山南路。版图扩充，御史曹学闵于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奏请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乾隆批示："军机大臣议奏。钦此。"军机大臣议奏曰：

> 查《一统志》于乾隆八年告竣，书成三百五十余卷，自直隶各省而外，外藩属国五十有七，朝贡之国三十有一。凡版图所隶，声教所讫，无不载入。仰惟我皇上德威远播，戡定西域，收准夷之疆索，辑回部之版章，特命将军大臣分部驻守，一切制度章程已与内地省份无异。该御史所奏，查照体例将西域新疆一体增入《一统志》，以昭圣朝一统无外之盛，其事自属可行。至臣等奉敕所纂之《西域图志》，如《一统志》内所应载之分野、疆域、风俗、山川等类，无不备具。请即于《西域图志》一书内，将《一统志》所应载者，按类择取，比照《一统志》体例稍为辑改，增入《一统志》之末，以成全书。再查《一统志》，甘肃统部内所载之安西、靖逆二厅，即今《西域图志》内之安西府；朝贡诸国内所载之叶尔钦，即今《西域图志》内之叶尔羌，他如哈密、土鲁番二处，两书亦俱互见，将来增纂时，应于各该处各为发明申说。其《一统志》内，从前已经载入之数处，俱请无庸删裁，以致更换全书。但《西域图志》须俟现在所纂之《同文志》告竣后，再行增改。而《方略》一书，将来纂至续编，如善后事宜各条，《一统志》内亦有应行采用者，统俟将来《方略全编》告成时，再行办理。[12]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钦定大清一统志》书前《上谕》曰：

> 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其尤甚者，《顺天·人物门》内，竟将国朝诸王载入，于事理更属纰缪。诸王事绩自载《八旗通志》，原不得与隶籍京圻者同日而道，况八旗大臣等功纪太常者，则应见昭忠贤良诸祠，其在直省宣猷著绩者，又有各省名宦可入。今乃援亲藩以淆地籍，实为拟不于伦义甚无谓。若其他考稽失实，与凡掛漏冗复者，谅均在所不免，亟应重加纂辑，以成全书。但前此修志之书，必待移取各省通志而后从事，以致旷日持久，艰于集事。此时特就已成之书，酌加釐核，即新疆幅员辽阔，而一切事实又有《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馆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可即令方略馆按照各条厘订纂辑，一并纂出稿本，悉照《续文献通考》例，随缮随进，候朕裁定。所有一切应行规条，著军机大臣详议具奏。钦此。

排比、综括这几条史料，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纂修缘起就比较清楚了。清朝版图扩大，行政区划变更，《西域图志》编纂，全国舆地图重新绘制，那么《一统志》也当增补，故有曹学闵奏请。乾隆命军机大臣议奏，军机大臣议复，主张利用《西域图志》资料，将西域新疆增补《一统志》之末，此须待《西域图志》、《方略》成书后，再行办理。但不同意根据新的行政建置逐一刊改前志，因为行政区划变更频繁，志书不能随时更改。实际上志书记事是有断限的，所记是一个时段内的因革变化，并不是随行政建置的变化

而不断刊改。然行政变更宜有专项记录，为以后修志积累资料。军机大臣昧于志事，所以才有多余的顾虑。乾隆不仅注意到西域新疆、郡邑变更宜应增入《一统志》，还注意到康熙《一统志》记载体例、征引详略等方面的未协之处，及考稽失实、挂漏冗复等，决计“重加纂辑”。他又总结了前志在纂修方面所走过的弯路，“必待移取各省通志而后从事，以致旷日持久，艰于集事”，故对新志的编纂在方法上进行调整，“特就已成之书，酌加釐核”，以《西域图志》、《同文志》为蓝本，采撮排撰，以求“事半功倍”。乾隆的上谕，为再次纂修《大清一统志》确定了方向、道路，至于如何编撰，“应行规条，著军机大臣详议具奏”，工作程序甚有章法。从清宫档案史料和四库本《钦定大清一统志》书前“上谕”内容看，曹学闵奏请，军机大臣议奏，乾隆上谕，前后时序清晰，但所记时间并不一致。军机大臣奏折末署“十一月二十七日”，乾隆上谕，首言“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反复权衡比较，“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似无误；“十一月二十七日”似为录副日期。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纂修工作的启动当确定在二十九年十一月。

这次纂修《一统志》，没有专门设馆，而是由方略馆承办。方略馆是附设于军机处的一种临时性修书机构，军机大臣兼掌馆务，无专职总裁官。乾隆《大清一统志》之纂修，自然由军机大臣负责组织人力进行编辑、考订，纂修人员多选自翰林、中书等官员。

志事铺开后，也遇到资料缺乏的问题，所以又像康熙志那样，征集通志于直省。阿思哈《乾隆续河南通志序》曰：“皇上御宇之三十有一年，文教肆讫，武功遐播，幅员式廓，百度咸熙，爰谕部臣请重修《一统志》，诏取直省志乘以进。”[13]移取直省志乘以供《一统志》采辑，势必拖延时日；其次，方略馆修书摊子过大，《西域图志》、《同文志》、《方略》、《一统志》等同时进行，也必然影响到进度；再次，《一统志》无专职总裁，组织管理不力。所以又陷入了“旷日持久，艰于集事”的地步。

乾隆四十一年，底定大小金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幅员益广，政治划一，续编《一统志》的重要意义又凸显出来。而且，《平定准噶尔方略》于乾隆三十七年完成，《西域图志》已大部分成稿，至四十七年告竣，方略馆可以腾出部分人手专心致力于《一统志》。这样，在皇帝的一再督促下，《一统志》的编修进度加快。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军机大臣等奏：“遵查承办未竣书籍，共十六种。内《通典》、《通志》二书派有专管总裁。《日下旧闻考》亦派有总裁，惟《一统志》、《西域图志》……等书，未经特派，应派专管之员，责成定限速纂，并统交稽查上谕处稽查。”皇帝谕示：“《一统志》著派袁守侗、和珅。”[14]

和珅出任《一统志》总裁官后，很会迎合乾隆皇帝的意愿，着力督促《一统志》的撰修进度，但由于规模较大，《一统志》也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军机大臣等奏：“《金川方略》、《大清一统志》、《元史》……等书，卷帙较多，请展限赶办。”皇帝旨曰：“各处应进之书，止须按卯分进，转不必立定期限，如届期迟误，即奏明参处。”[15]乾隆允许展期完成，不仅考虑到《一统志》卷帙多，对于志书质量也当有所顾及。

《一统志》稿陆续撰成后，遵循乾隆“随缮随进，候朕裁定”的谕旨，分卷呈上御览。乾隆亲自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三十日上谕，针对《一统志》稿不载张照一事，提出收录人物的标准。曰：“昨阅进呈《一统志》内，国朝松江府人物，止载王项龄、王鸿绪诸人，而不载张照。其意或因张照从前办理贵州苗疆，曾经获罪。又其狱中所题白云亭诗，语意感愤。经朕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因而此次纂办《一统志》，意将伊姓氏居里，概从删削，殊属非是……张照虽不得谓醇儒，而其资学明敏，书法精工，实为海内所共推重。瑕瑜不掩，公论自在。所有此次进呈之《一统志》，即将张照官秩出处事迹，一并载入。其各省志书，或有似此者，纂修诸臣，皆宜查明奏闻补入，并通谕中外知之。”皇帝明确提出入志人物的取舍、评价标准要客观公正，有益于提高《一统志》的纂修质量。

乾隆四十七年，由于《西域图志》等书告成，《一统志》编纂资料愈益丰富，方略馆的主要任务即纂修《一统志》，期限明确，务求告成，最终于乾隆四十九年成书，所收录各项档册，也“以四十九年送核者为断”[16]。乾隆五十四年正式呈上，由和珅奉表恭进。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之纂修，前后时阅二十载，书凡424卷，加上子卷为500卷。

《钦定大清一统志》成书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评曰：“适乾隆二十年，天威震垒，平定伊犁，拓地二万里，为古舆图所未纪。而府州县之分并改隶，与职官之增减移驻，亦多与旧制异同。乃特诏重修，定为此本……该版图廓于前，而搜罗弥博，门目仍其旧，而体例加详。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17]

乾隆《一统志》较康熙《一统志》完善，主要体现在：

其一，增补门类。增加了“新疆”一门，“西域新疆幈幪大化，其肇设之安西州、镇西府、迪化州，皆督臣所辖，宜隶甘省。至伊犁之东西路、回部，自哈密闢展至和阗，创撰‘新疆’一门，次于直省之后。其慕化各藩、哈萨克等，并撰新疆藩部，次于蒙古各藩部之后”。[18]

其二，改进体例。“志内山川次第以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为序”；“援引各书具于每卷，首见之条，增列著书人姓名，以便考览，其有前志所载，考证未的，字句未醇及疏略者，注意校订改补，以期无缺无漏。”[19]

其三，添补前志未备的内容。“木兰围场前志未备，兹恭依《热河志》，分列御苑四正四隅，载于新创承德府卷中”；“直省新葺之城池、学校，并海岳江河神庙暨诸寺观之奉敕修建及赐名者，一一据册甄载”；“直省名宦、人物，前志未有备者，并确查史传增入其顺天府卷中，国朝诸王及八旗大臣等事迹已载《八旗通志》，兹不重载，其八旗大臣中，职任封疆政绩懋著者，仍载入各省名宦中，至比来物故之文武大臣中有治行彰显，曾经奉旨褒嘉入祀贤良昭忠祠者，俱遵查国史一并载入；前朝忠烈诸臣，于乾隆四十一年，奉旨赐谥，其姓名、事迹未入前志者，俱照《褒忠录》详查载入；直省孝顺节烈叠年以来奉旨旌奖，均查册载入，每县以最先一人，大书为纲，余以次类注其下。”[20]

其四，修改前志错误或不妥之处。“山川古迹向有承讹袭谬，习传不察者，叠经皇上睿论指出，审辨讹舛。兹恭遵改纂，并历叙旧文，加案语声明于后”；“辽金元史中，人名地名见于志者，均遵新译改正，并注明原作某，今译改等语于各条之下。奉天及蒙古、西域等山水地名，并照新译字样登载”；“外藩各部自内札萨克、察哈尔至喀尔喀、青海、西藏诸境，并详核其山水形势之迹，至封爵旗分添设、移改并世袭传次之数，均确查理藩院册籍登纪”。[21]

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在后期总纂成书时，急于求成，未免会有仓促之处，致使初修本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在续修本中依然存在。后来道光时，国史馆重修《一统志》，总校对官龚自珍检核乾隆志，发现其记载多有失误，因撰《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22]，特就西北两塞外部落世袭、风俗、形势、源流分合，费力稽考，胪列出十八条，或补乾隆志之缺，或正其误，或校其偏，或纠其讹。至于“余小事，头绪尚多”，不一而足，可见乾隆志问题之多。

魏源在撰《圣武记》时，也发现了乾隆志所存在的问题。曰：

> 官书之弊，莫患于两不收。盖分门各纂，互不相应。如雍正中，北路大军始驻科布多，继移察罕瘦尔，乾隆中又移乌里雅苏台，是三地为屡朝筑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统志》成于乾隆平定新疆之后，乃于此三地一字不及。盖图伊犁者，既以科布多之东属喀部，非伊犁将军所辖；及图喀部，又以此三地驻官军，非蒙古汗王所辖，故两不收。[23]

又曰：

> 《一统志》于“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东北濒海，有赫哲、费雅喀、库伦、鄂伦春、绰奇楞、库野、恰喀拉诸部落，各沿海岛居住，每岁进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鄂伦春并设佐领供

调遣，皆隶于宁古塔、黑龙江将军，地虽极边，人则内属，故不列于外藩”云云。夫既不列于外藩，则东三省边城中谅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此又两不收之一失也。至于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锡伯、卦勒察、毕勒尔等兵，均为东三省驻防劲旅，其人既非满洲，自当详其部落，乃《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与夫《一统志》、《会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为“索伦兵”，无知此何种落者。何况天命间削平诸部概归满洲者，更谁问其今为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谭本朝之掌故，钩稽不易如此，又何论远古？何论荒外？[24]

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的诸多不足与失误，又为以后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设下了可能。

四、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之集成

嘉庆十六年正月，方略馆奏请补修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曰：

恭查乾隆二十九年奉命续纂《大清一统志》，全书当经遴派翰林、中书等在方略馆纂办，计成四百二十四卷，移交武英殿刊刻，次第竣工，其间鲁鱼亥豕，间有不免，亦节经雠校多次，可以刷印。惟思此书括载舆图，博综志乘，必须荟萃齐全，方成善本。从前续纂之时，系断以乾隆四十九年为止，至五十年以后，有一切必应载入之处，未臻齐备……如“外域门”内，缅甸、越南、巴勒布、廓儿喀等处，投顺锡封；又如台湾、蛤仔烂归入版图，亦皆属事之大者。至如各直省添设文武官职，以及郡县厅营裁置归并，城池、学校增设游移，或地名与今不符，或事实与前互异，若不添补改革完善，碍难请旨颁行。现在国史馆办理《地理志》一门，即需是书参考，似此编辑未全，殊难移交作为根据。臣等公同酌商，拟请敕交武英殿就现在所刻，先刷印一二部，同方略馆所存正副各本交国史馆派员查明，自乾隆五十年以后，至嘉庆十五年以前，凡应行补载者，一并依类敬谨列入，并将全书通行详校，以免疏漏脱误。其国史馆现纂《地理志》一书，即可就近参考成编，更为周妥，敬俟命下之日，立限赶办，交武英殿修补齐全，届时刷印，请旨颁行，庶全书愈昭美备，足以光册府而垂永久矣……正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25]

方略馆的奏请，本欲修补乾隆志，但实际上，却成了《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起因，所以学者多以此为清廷第三次编纂《一统志》的开始。

嘉庆重修《一统志》是由国史馆承办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国史馆档案》编纂类第1号卷《现在纂办各种书籍》，记录了当时国史馆办理《一统志》的计划。曰：

《一统志》全书于嘉庆十六年正月由方略馆奏交本馆纂办，当经本馆议奏，所有通体沿革、裁改各事宜，其在京各衙门，令于三月内交全；在外各省，令于半年内交全。俟各衙门各直省交全后，立限二年，将全书纂校进呈，俟钦定后，咨送武英殿刊刻。

国史馆纂办《一统志》，基本上遵循了方略馆的建议，主要是补撰乾隆五十年以后的事项，其工作计划也与康熙志、乾隆续志一样，先征集资料，再事编辑，然后再通行详校成书，分别以三个月、半年、两年立限。

为纂修《一统志》，国史馆专门增添汉总纂官二人，汉纂修官八人。由潘锡恩任提调总纂官，廖鸿荃任总纂纂修官[26]，继任提调总纂官有杜受田、祝庆蕃、王植、徐士芬、毛树棠、周祖培、李钧、文俊；继任总纂纂修官有沈岐、姚元之、李煌、季艺昌、李品芬、善焘、冯芝、王炳瀛、朱嶟、柏葰、黄爵滋、贾桢、德春、明训、舒兴阿、吴其濬、吴文镕、李星沅、张日晸、王笃、曾望颜、德兴、德诚、赵光博、迪苏、广林、陆建瀛、常大淳、全庆。[27]前后人数之多，说明《一统志》总纂官更换较为频繁。

嘉庆十七年四月，皇帝曾谕曰：“嗣后各馆筹办书籍至一百数十卷以上，准其奏请优叙。”[28]这一谕旨，嘉庆帝的本意是欲限制各馆编辑成书不论卷数多寡都想邀功请赏的现象，

但客观上对诸如《一统志》等书的纂修有促进作用。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新即位的道光皇帝又谕“武英殿刊刻各馆书籍，交原馆校对，有迟至十余年未经办竣者，实属延缓。其应如何限期之处，著军机大臣详查覆议具奏。嗣后武英殿写样交原馆校对者，书百卷，以半年为限，武英殿修改误字，一千字，以二十日为限。迟逾分别参处。”[29]嘉庆、道光发布这些谕旨，实为督促各馆修书进度，其中也包括《大清一统志》。尽管皇帝一再督促，但《大清一统志》纂修进度仍甚缓慢，期限一再拖延，直到嘉庆二十五年，所征集的材料并未齐全，无法按类编辑。而且《大清一统志》卷帙浩繁，与国史馆“常行功课不同”[30]。工作量繁，难度大，不可能在一二年或数年内完成。再者，嘉庆十二年七月，国史馆续修十四志，十六年又启动《一统志》的编纂，力量分散，又相互掣肘，所以终嘉庆一朝，《重修大清一统志》未能成书。

道光十六年，又敕“续纂《蒙古王公表传》、《大清一统志》。”[31]由国史馆总裁、大学士穆彰阿主持重修《大清一统志》，充实纂修人员，加紧征集各地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为断。穆彰阿坐镇馆务，调度指挥，“督饬在馆各员，将全书纂辑”[32]。国史馆上下主要人员基本上都被动员起来，从道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重修《大清一统志》成了国史馆的主要任务，所以各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大为加快。至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告竣，道光皇帝为之御制序文。曰：“兹全书告成，沿述于开国之初，增辑至嘉庆二十有五年，为卷五百有六十。”

清代统治者欲借纂修《一统志》，宣扬天命、一统、德威、功绩、政教，兹者不仅是一项文化工程，也是一项政教工程，是国家强盛的象征与标志，故自康熙至道光，历代皇帝不仅重视而且热衷《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嘉庆重修一统志御制序文》由何绍基拟稿。何氏《东洲草堂文抄》卷三载有《恭拟增修〈一统志〉御叙》，将《恭拟御叙》与《御制大清一统志序》对照，二者在文字上多有出入，可见道光皇帝钦定时曾有修改。

自嘉庆十六年开始重修《一统志》到道光二十二年完成，前后三十一载，参与纂修的人员很多，包括提调兼总纂潘锡恩等，总纂纂修官廖鸿荃，还有总校对官龚自珍等。书成，由总裁官穆彰阿等奏上，请旨议叙“在馆之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校对、收掌、翻译、誊录、供事等官……核其功课多寡，分别一二等，咨部给予优叙。其中悉心校勘尤为出力之汉校对、内阁中书宗稷辰、贺式韩、沈维钰三员可否敕下吏部酌给升班，以示鼓励。”[33]

清廷通过议叙升迁，奖励重修《一统志》有功人员，包括提调兼总纂官 9 人、总纂纂修官 30 人、校对官 3 人、收发 3 人、笔帖式 4 人、供事 19 人。尤其是校勘、收发、笔帖式、供事等人员，多为在馆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事细心认真的人，长期沉沦史馆，很难有升迁机会，许多人又是自带“斧资”，清苦不堪。《嘉庆重修一统志》之所以能撰成，这些人的作用与劳绩不可忽视，已有的研究大多不注意此，兹特别指出。

《嘉庆重修一统志》被公认是清《一统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其原因在于纂修官学风严谨，考订精审，又有前两部《一统志》作为蓝本，还有“部、院、寺、监并各直省来册”[34]可据，修志的馆臣根据各省提供的资料，“采用群书，自国史外，如《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确切参稽”[35]，因而内容较前两志丰富而且准确。

《嘉庆重修一统志》首京师，次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共二十二个统部和青海、西藏等地区，最后附以“外域朝贡各国”。各统部先有总图、总表、总叙。内地统部各省“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边疆各统部叙及内容与内地有所不同，相应增叙“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山川”、“土产”等不一，京师及兴京所在的盛京统部，另有“城池”、“坛庙”、“山陵”、

"宫殿"、"苑囿"、"官署"等项，与其他地区略有区别。统部之下再以府、直隶厅、州分卷，各卷之下又有图、表，然后分叙"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五目；边疆各统部之属部目次略异，主要是因地制宜设置门类，在新疆统部下属部新增加了"度漠驿站"门；盛京统部增加了"关邮"、"城堡"、"山陵"、"行宫"门；乌里雅苏台统部属部增加了"晷度"、"山川"、"卡伦"、"属境"、"台站"门；贵州统部增加了"苗蛮"，记当地少数民族情况；青海、西藏不称统部，无总图、总表、总叙等项，直接记述各部的情况。

《嘉庆重修一统志》成书后，并未刊行，国史馆储有进呈本和副本，民间也有抄本流布。章梫《一山文存》卷十《题钞本道光重修一统志（乙卯）》，曰：

> 京外通行乾隆时所修《大清一统志》，以第二次所修者为最详，即所谓四十九年本也。至嘉道间所修，截至嘉庆二十五年止之《一统志》，经大学士穆彰阿等奏上者，原无刻本，外间未之见也。予在史馆读进呈本及副本，皆精写，皆缺十数卷。正、副本合校，缺仅数卷。在京师时，常留意及此，未闻有家藏抄本者。乙卯夏，孙君星如于上海购得抄本《一统志》云南省大理府等十府四巨册，则嘉庆二十五年本也，字迹似当时馆中供事手笔，其为馆臣私写以归无疑矣。其是否即馆中所缺之卷，不复记忆。在昔寿阳相国为翰林时，抄得嘉庆《一统志》，张石舟明经据以撰《蒙古游牧记》，世称博核。予为参考，无一字不出于嘉庆《一统志》，特面目少变异耳。

从章梫题跋看，嘉庆《一统志》成书不久，即有散佚，后来的国史馆曾将正、副本合校，有所补遗。外间抄本亦不啻一部；张穆《蒙古游牧记》据《嘉庆一统志》撰成。寻常史著多认为《蒙古游牧记》主要依据祁韵士《藩部要略》而成，不曾提及《一统志》抄本，章梫之言于此可聊备一说。由于《嘉庆重修一统志》成书后，未能及时刊行，故流布不广。1914 年至 1928 年北洋政府修《清史稿》，搜集清代史料，才发现了较全的《嘉庆重修一统志》抄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于 1934 年将之收入《四部丛刊续编》刊行，由张元济题写跋语。

五、清廷三次纂修《一统志》的启示

清廷三次编纂《一统志》，在大型文化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教示：

第一，重大文化工程如何确立并贯彻时代主导意识。历代王朝特别是大一统王朝都十分重视地理总志和一统志的编纂，这与封建君臣强烈的一统亦即正统意识有关。正统意识既是一种传统意识，又是一时代意识，许多有作为的帝王正是在此意识指导下，创建国家，治理国家，并将之贯彻于文化工程建设。康熙皇帝说："朕缵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因命纂《大清一统志》，并要求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宏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36]君临天下，必知天下，知天下须借修书。徐乾学《备陈修书事宜疏》曰："《大清一统志》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用昭我皇上车书一统之盛，贯穿古今，有裨治理。"[37]程廷祚《修〈一统志〉议》亦曰："王者光有天下，谓之一统；则其为书，非徒以志郡县之沿革广狭也，非徒以志名胜之有资于流连观览也，非徒以志古迹、名宦、人物之时代先后，必将举天下之大经大法，以推明光天下之义，而得为《一统志》之书，而后独见其为一代之制作。故正其义者，所以正其名也。义正、名正，则例可得而举矣。私谓其中有当明体国之义者，有当明画野分州之义者，有当明以地承天之义者，有当明经世之义者，有当正文字详略之义者。"[38]徐乾学为《大清一统志》立凡例，尤重义例与经世，"庶几体国经野，不窥牖而可

知；观民省方，如指掌而斯在。”[39]这种“一统”与“经世”意识都是清廷纂修《一统志》的主导意识。三次纂修一以贯之，所成三部《一统志》，看起来多是资料编辑，实际上都有很强的思想性。

第二，盛世修志修史与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大清一统志》的编纂都是在版图不断扩大，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的背景下进行的。乾隆续志因缘于“舆图日廓，户口日蕃，田赋日殷，府州厅县建置分并及人官物土之盛日著”[40]，嘉庆重修志也是由于“国家幅员日辟，户口日蕃，田赋日充，人官物产之华日著”的缘故[41]，君臣欲借修志编书彰显文治武功，康、雍、乾、嘉、道五朝是清朝的兴盛时期，盛世修志编史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带有规律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清朝三次编纂《一统志》也是必然的。编修《一统志》，不仅仅是文化盛事，也是国家强大的象征。从《大清一统志》的作用和影响看，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对盛世的粉饰，其对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往往是人们所预料不及的。

第三，大型文化工程如何在总结和继承已有成果基础上创新。编史修志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全国性地理总志，历代多有编纂，而且一修再修，论纂修次数，清朝与宋代相埒而不及唐代，如果仅就《一统志》的纂修次数讲，元、明、清三代以清为最多，元凡二修，明一修，清三修，康熙志曰“始修”，乾隆四十九年本曰“续修”，嘉庆志曰“重修”。清廷三次编纂《一统志》，其规模均超出以前各朝代，并且在内容上，既一脉相承又有因革变化，条理愈益清晰，内容不断缜密完善，讹误越来越少，最终形成了《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成为记述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清代舆地资料最全、研究价值最高一部地理总志。张元济为之作《跋》，评曰：“居今日而治舆地之学，欲求一官本且后出而信者，宜莫如此书。”[42]或曰此书“是一部历代总志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历朝修得最好的一部全国总志”，收录地名、物名等 14 万多条，“迄今我们凡需查证各地历代建置沿革或确定古地名的方位等，依然离不开它。”[43]嘉庆志对于前志的总结继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续、补、创、改。续即续修前志下限之后所未及记载的内容；补即补撰前志所遗漏的事项；创即随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创设新的类目；改即改正前志的讹误。由此四方面而得一较为完善之本，嘉庆志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而能后来者居上。道光元年至宣统三年，因未曾续修《一统志》，所以这一时段的舆地资料未能详细而系统地整理，新编《清史·地理志》正可借鉴嘉庆志，填补空缺。

第四，奖惩机制在文化工程建设与管理方面的作用。清代修书例以议叙封赏激励纂修人员。三修《大清一统志》告竣，贡献较大之纂修人员均受到议叙。康熙志纂成后，监理、总裁、提调、纂修、收掌、誊录、监造等 181 人受到议叙封赏。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告成，总裁穆彰阿依据国史馆日常功课考绩，将纂修人员分为两等。对于卓有劳绩者，开具名单上报皇帝，请予议叙。特别是对于那些多年供事于国史馆，于编纂《一统志》出力贡献甚多的地位低下人员，给予封赏奖励，一些布衣秀才借此获得登朝入流的晋身机会，自然甘愿为编修《一统志》多作贡献。这些人是纂修人员较为稳定的一部分人，多从事校勘、收集、翻译、誊录、供事等。相对来说，总裁、提调、总纂、纂修等官员调动比较频繁，经常影响到志书的编纂。为了稳定纂修人员，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礼科给事中李迥条陈：“各部院衙门纂修会典官员应停其升转差遣，俟告成之日，从优议叙。”[44]并得到康熙皇帝的允准。此后三修《一统志》，后期成稿时，也曾仿效此成例，保障纂修工作顺利进行。

第五，《大清一统志》的编纂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我们思考。一般说来，大型文化工程很少有在数年内完成者，成书越促，留下的遗憾则越多。清朝三修，每次久费时日，一方面固然是《大清一统志》难度大、工作繁；另一方面是组织管理的不力。从时间分配上看，三次纂修都存在前松后紧的现象。当工程上马时，缺乏细密的论证，对纂修工作的难度和繁剧，缺乏足够的估计。康熙曰：“纂修《明史》，俱撰文字，故多费时日。若修《实录》、《会典》以及此书，不过誊录，并非撰文，岂宜迟缓？”把《一统志》想象得很简单，不过是各省《通志》的汇编，抄录编辑即可。这样，须向各省征集《通志》，各直省又征集辖境内府、州、县志，逐级征集资料，势

必牵扯面太广，很难整齐划一。地方亦多敷衍应付，报上来的材料牴牾冒滥。待材料稍集，方苞试撰一郡志稿，先由生员初校，再由副总裁杨次山复核，方苞三校，然后誊录清稿，"及观清本，而罅漏又自见矣。班覆之而更写焉，自视若无遗憾，及各府州志毕萃，而叉牙相抵者且百出矣。"通过撰写，切身感到《一统志》纂修之繁难与曲艰。对困难估计不足，必然使组织准备等各项工作不能到位，逐级征集方志资料，牵扯面广，势必有脱节、不协调之处，反而耽误了时间。到乾隆续修《大清一统志》时，已经看清了这些纂修工作中的弊病，故乾隆上谕曰："前此修志之书，必待移取各省通志而后从事，以致旷日持久，艰于集事。"虽然他看到了康熙志拖延时日的原因，但未能体会到纂修《一统志》的艰难，仍然将续修《一统志》简单化，指示馆臣"特就已成之书，酌加釐核……又有《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馆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可即令方略馆按照各条厘定纂辑，一并纂出稿本，悉照《续文献通考》例，随缮随进，候朕裁定。"这时，《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还未成书，编修《一统志》的资料严重缺乏，馆臣不得不再次征集各省通志，《一统志》工程进展缓慢，待部分志稿初成，又"随缮随进，候朕裁定"，白费许多周折，徒耗诸多年月。嘉庆年间修《一统志》，起初打算只是修补，随着修志工作的进展，认识到旧志问题太多，于是决定改补修为重修。由于对《一统志》纂修的难度认识不够，所以，三次编纂都出现了前期松懈、不注重效率的情况。从另外一些方面讲，清廷往往是几部大书同时编，也影响了《一统志》的进度。

---

①余国柱《康熙江南通志·序》，康熙二十三年(1684)江南通志局刻本。

②徐乾学《憺园文集》卷35。

③④徐乾学《憺园文集》卷10《乞归第三疏》。

⑤⑦顾琮《乾隆江南通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第8页。

⑥清光绪八年刊本，台湾华文书局印行。

⑧《道光赵州志·旧序》，张允随撰，1937年石印本。

⑨《方苞集》卷6《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⑩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钦定大清一统志目录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⑪见《康熙大清一统志表》，清乾隆九年武英殿本。

⑫《乾隆朝上谕档》第四册《军机大臣、大学士公傅等人奏折》，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526-527页。

⑬乾隆《续河南通志》，乾隆三十二年刻本。中国省志丛编之十四，台湾华文书局影印。

⑭《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029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800-801页。

⑮《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052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上，第59页。

⑯⑱⑲⑳㉑㊵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

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㉒《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中华书局1959年版。

㉓魏源《圣武记》卷12《武事记余·掌故考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5页。

㉔魏源《圣武记》卷12《武事记余·掌故考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8页。

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十六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㉖㉘㉚㉜㉝见《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书前穆彰阿《奏进〈大清一统志〉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㉗《嘉庆道光两朝上谕》四七，道光二十二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第533页。

㉙《清实录·宣宗实录》卷6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4页。

㉛《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51，第534页。

㉞㉟㊶《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凡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㊱《清实录·圣祖实录》卷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2-343页

㊲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8页。

㊳程廷祚《清溪集》卷5《修〈一统志〉议》，黄山书社2004年。

㊴徐乾学《大清一统志凡例》，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第240页。

㊷张元济《嘉庆重修一统志跋》，《四部丛刊续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㊸《清代社会文化丛书》，第192-193页。

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88页。